



跟随洪学智部长 两次进青藏

文／张金昌

我1953年7月从军校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总后营房部工作。在大机关见到大首长的机会虽多，但真正面对面的直接聆听大首长的教诲却没有。1956年机会终于来了。6月，国防部决定成立由三总部人员参加的工作组去大西北调查部队的情况，由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上将任工作组组长。当时的大西北也是全国最艰苦的地区，尤其是驻扎在青海格尔木、果洛、玉树、甘南、川北地区的部队，条件更为困难。当时我刚从青海格尔木出差回来，深感从西宁至格尔木沿途兵站的困苦，如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住的全是帐篷，吃的全是罐头，根本吃不上蔬菜，气候还十分恶劣，随时都会有暴风雪和沙尘暴出现，特别是蚊虫多的出奇，而且个儿又大，号称三个蚊虫一盘菜，白天不管干什么都要戴上防蚊帽，刮大风时，人们赶快去大便，否则，蚊虫会叮满屁股。那时的格尔木除了汽车部队和兵站外，只有少数流动的游牧民携带牦牛帐篷驻扎在有水的草地上。当洪部长知道我刚从格尔木回来后，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询问我在格尔木的所见所闻。当我向洪部长汇报完情况后，洪部长决定我继续随他去西北调查研究。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一次跟随我军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出差并面对面地汇报工作和聆听指示，心里感到十分欣喜。

工作组到达兰州军区后，首先听取了张达志司令和洗恒汉政委的汇报。根据洪部长的指示，在大军区的配合下，组织若干小组分赴当时西北最艰苦的川北和甘南、青海

的果洛和玉树等地。我被分配到了果洛地区。从西宁到果洛没有公路，汽车在草原上全靠指北针和草地上的车辙痕迹辨别方向。工作组带着帐篷和锅碗瓢盆，一路上摸索前进。早晨出发，中午靠干粮充饥，下午太阳下山前，找个有水的地方就地搭帐篷，挖坑置锅灶，自己做饭吃。当地的老鼠多得出奇，晚上睡觉时老鼠经常从脸上爬过。这种老鼠吃草根，破坏草原，对牧民影响极大。第二天早晨起床，吃完早饭收起帐篷继续赶路，就这样整整走了三天，才到果洛军分区。分区驻军的房子，除了帐篷就是土坯房或地窖子，交通工具全靠骑马和马拉跑车，条件异常艰苦。几个工作组调查回来后，就部队的吃穿住行，医疗卫生，训练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向洪部长进行了汇报，首长听得十分认真仔细。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洪部长还亲自深入到基层官兵中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当时正是中央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通知洪部长回京开会，他只好中途回去参

加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洪部长当选为中共中央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我们工作组继续调查，直至完成任务后才回到北京。洪部长听取我们的汇报后，很快向中央军委、国防部做了专题汇报。军委很快批复提高西北艰苦地区部队的经费标准，从政策上给予很大的倾斜，大大改善了西北地区部队的生活条件，受到部队指战员的广泛赞扬。

1959年3月，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变失败，向印度方向逃窜。但西藏的叛军大部分都在西藏地区，基本上都带着牛羊马群，背着长枪短刀，躲藏在山腰中伺机反扑。党中央决定派洪学智部长带领三总部工作组亲临西藏组织平叛指挥，消灭残余叛军，建立稳固的西藏边境线。我又一次幸运的参加平叛工作组，随洪部长赴藏。当时我部除我外还有吕幕处长和塘培三同志。三总部工作组分乘四架运输机直达格尔木机场，随即在格尔木组成平叛运输指挥小组。西藏和平解放后，进藏部队和西藏地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吃穿住用，一



当年，洪学智部长带大家都走到了青藏线的每个兵站，就是要保证这条“生命线”的畅通



本文作者与洪学智将军亲切交谈



洪学智将军和夫人张文到部队招待所看望老部下（中为本文作者）

粮一草，一针一线主要靠青藏公路运输线供应保障，因此格尔木就成了这条运输线的中心枢纽，是连接青海、甘肃到西藏的桥梁。为了保障西藏部队和政府物资的供应，确保青藏线上的供给运输通畅，洪部长亲自带领部分二级部领导（胥光义、罗文、王希克、伊文、唐成仪等）和少数人员从格尔木出发，坐汽车沿青藏线兵站一个个地检查了解。谁都知道这条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长、气候环境最恶劣的一条公路，平均海拔都在四千米以上，空气稀薄、缺氧。沿途兵站的条件更苦，住房全都是帐篷和地窖子，吃的全都是罐头和干菜，米饭馒头都是半生不熟的，干部、战士和过往部队晚上都是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穿着大头鞋睡觉，早晨皮大衣和皮帽子都冻在一起。气温大都在零下二三十度。气候经常一天三变，白天突然刮起风沙，伸出五指都看不见，时而又突降鹅毛大雪，大雪封路后，靠战士边挖边进。当时从格尔木到

拉萨仅有的一条 2000 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就有四个汽车团在负责运送物资。由于路况很差，不到一年的工夫就有 2000 多台车坏在沿线上公路上，平均每公里要摆一台车。可想而知，这条运输西藏一切物资的“生命线”是何等的艰苦呀！可是我们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们却无所畏惧克服了种种困难，想方设法完成运输任务。这就是洪部长为什么要带着一些二级部领导亲临各兵站了解察看，体验和关心部队艰苦的原因，就是要保证这条“生命线”的畅通。青藏线的每个兵站，洪部长带大家都走到了，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即拍板解决，指定专人负责抓落实。这次进藏，使青藏公路沿线兵站的吃住衣着问题以及汽车的大修和换装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如仅汽车一项，四个汽车团原先配的都是四吨的解放牌汽车，几乎都坏在路上了，之后全部换成了进口的十多吨位的大依发和斯格达汽车。为进藏部队和物资输送提供了保障。青海

和西藏，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又很恶劣，但驻扎在青藏高原部队的干部战士的坚强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决心，以及乐观精神时时感动着我们。你能想象得到首长与战士同乐的情况么？我们到达格尔木的第二天，青藏办事处为了欢迎工作组的到来，开了一个欢迎晚会。在一顶大帐篷里，地面是土的，敲锣打鼓，甚至用脸盆当乐器，洪部长带领工作组和办事处的干部战士一起歌舞同乐。世上还有比这更简单的“舞会”吗。我们的车队翻过唐古拉山时，总后某二级部长唐成仪同志因高山缺氧病倒了。洪部长当即决定用氧气车直送拉萨，因为当时有位“专家”在西藏军区卫生处工作。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将军，那是医学界的权威，因对中医政策有看法，被“下放”到西藏军区卫生处当副处长。唐成仪同志一到西藏，宫乃泉同志立即组织抢救，使唐成仪同志很快脱离危险。随后派专机送回北京康复治疗。直到 2009 年因病去世。另外我们进

藏时，由于达赖刚刚叛逃，局势很乱，当时估计，西藏100多万牧民中，混杂着“叛军”，青藏公路沿线也不安全，尤其是工作组坐汽车沿兵站进藏，沿途遇到“叛军”袭击也是常事。所以我们的汽车部队人人都带枪自卫。工作组除了洪部长外，还有五六个二级部的高级将领。为保证沿途的安全，除带一个排兵力跟随保护外，其他同志的乘车内都有大量的手榴弹，每个干部还配有手枪或冲锋枪，以防万一。当我们的车辆到达温泉兵站时，人人都感到呼吸十分困难。温泉兵站海拔5700米，空气非常稀薄，人的行动缓慢至极。从兵站到温泉斜坡约50米远，走在上面举步艰难，每次大喘气后都要停下来，调节呼吸平稳后再往上走，就这样，休息四五次才到温泉。当时发现草地上老鼠洞特别多，洪部长对大家说，让我们在青藏沿线上的最高兵站留点纪念吧。说着让把车上的铁锹拿下来挖老鼠洞。大家边挖边大喘

青海和西藏，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又很恶劣，但驻扎在青藏高原部队的干部战士的坚强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决心，以及乐观精神时时感动着我们。

气，当挖出一个老鼠洞时，大家都围着打，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伙好像都忘记了身体的疲惫。就这样，“苦中作乐”的精神陪伴着我们，终于顺利到达拉萨。

我们到达拉萨后，听取了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的汇报。洪部长传达了中央军委领导对西藏平叛工作的指示，研究部署了西藏平叛的有关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开会期间，张国华司令员曾开玩笑

的指着我对洪部长说：“这个年轻干部给我留下，我要了。”洪部长当时笑了笑没有表态，否则我一生的历史肯定要重新改写了。当时西藏军区没有招待所，正好达赖喇嘛跑掉了，他的宫殿罗布林卡给我们工作组进驻了。虽然达赖跑了，但还有些活佛没走，替他看管财物。洪部长对民族政策十分重视，教导我们要遵守藏族的风俗习惯，爱护宫殿的各种设施。除了缴获的印度和英国的饼干可以给大家吃外，其余达赖的东西都保存完好无损，这给达赖身边没走的喇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平叛指挥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坐飞机回到了格尔木。洪部长在格尔木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青藏公路运输线的全线建设方案和具体实施办法。并决定将我和军械部的两位同志留在格尔木搞基本建设。我们在青藏公路指挥部主任宋西侯和政委李景展的直接领导下，在格尔木工作了十个月。组织了一个营的部队到西藏原始森林伐木，组织另一个团的兵力沿路开山炸石，利用进藏运输车辆的回空车，将喜马拉雅松木材和石料运回格尔木。我们在格尔木组织军工和民工进行施工自建营房。到1960年春节前，将格尔木地区的青藏公路指挥部机关、格尔木大站、汽车大修厂、二十二医院和三个汽车团的20多万平方米营房建成后才回到北京。我们按时完成了洪部长交给的营房建设光荣任务，使青藏公路这条运输线充分发挥了物资运输的能力，保障了西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的长期稳定。中



唐古拉山兵站依然耸立在青藏高原上